

## ·信札整理研究·

## 徐勣尺牋稿本考论\*

陈庆元

**内容摘要:**徐勣流传至今的稿本《红雨楼集·鳌峰文集》十二册,其中第三册至第八册为尺牋,藏上海图书馆。数百年来,徐兴公尺牋颇受关注,陈寿祺、陈衍等都有过简要论述。经过反复核对统计,稿本共有尺牋742通(含各自独立的残篇),去其重复2通,启体滥入1通,今存739通,尺牋收件人计352人(残件无法判断收件人不计,一通书信有两位以上收件人只计前一位)。徐勣去世后,稿本几经易手,收藏者重装,编排无序;我们重加编排,统计各年所作篇数,今存尺牋最早的是万历二十年(1592),最晚为崇祯十五年(1642),所存尺牋最多的是崇祯十三年(1640),计75通;五十一年间,有十年的尺牋全部散佚。收件人篇数最多的是李峻19通,5通以上计32人。兴公尺牋内容丰富,一方面可与其诗文互证及订补,另一方面披露了徐勣协助曹学佺编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、《石仓明文选》的细节,亦涉及到家事与乡里琐事等。

**关键词:**尺牋 徐勣 曹学佺

叶向高论尺牋曰:“余生平尺牋皆焚其稿,惟前次在纶扉有关系时政者,间存之,以附于《奏草》之后……检诸尺牋,凡属寒暄,悉投水火,所余无几,乃政地之艰难,疆事之得失大较可见。他日尚论著,亦或有考焉。”<sup>①</sup>叶向高是政治家,故其尺牋存其有关政局者。晚明闽人文集,保留尺牋最丰富的一是徐勣,一是龙溪张燮。张燮的《霏云居集》、《霏云居续集》、《群玉楼集》中尺牋的篇幅约占到五分一至四分之一之多,几乎有写必存。他认为,尺牋相当于日记,此言不差。明人绝大多数文集的尺牋都是经过作者或编者挑选过的,徐勣的集子经由徐勣之手编选,或是为了节省刊刻的成本,《幔亭集》所存大多是篇幅比较短小的“小品文”,即叙事性较弱的美文一类。徐勣曾与平和陈翼飞有过书信

\*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“徐兴公年谱长编”([2015]216号)阶段性成果。

①叶向高:《续纶扉尺牋序》,《纶扉尺牋》卷首,《苍霞草全集》第10集,广陵书社1994年影明刻本,第1-3页。

来往,今存万历四十一(1613)至四十三年(1615)尺牍三通;同是漳州郡人的张燮与他的来往就更多了,我们翻检陈氏《长梧集》,陈翼飞致徐爌、张燮的尺牍竟然一篇未录。我们今天见到的兴公尺牍多达七百多通,当是未经作者挑选、删削的底稿本,虽然未必篇篇都那么精粹,大多也无关政局大事,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真实的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、看到他的性情和思想,读叶向高的尺牍可考时政,读徐爌的尺牍则可考其生平著述。

我们在撰著《徐兴公尺牍稿本编年校证》、《徐兴公年谱长编》的过程中,研读徐兴公尺牍无疑是基础工作之一,历时数年,现将部分心得发布如下:

### 一、徐兴公尺牍的大致状况

《徐兴公尺牍》,福建省图书馆、福建师范大学均藏有抄本,抄本仅尺牍四五十通,不是本文研究的对象。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上海图书馆藏《红雨楼集·鳌峰集文集》(以下简称“《文集》”),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影印的《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》(本文注释简称“《上图稿本》”,同时不再注明出版社及出版时间)中的一种。《文集》分装十二册,册一为序,册二为启、议、铭文、祭文,亦夹杂少数序文;册三至册八为尺牍,册九至册十二为疏、偈等各种杂文,少数与册一、册二重复。明清易代之后,徐氏藏书逐渐散佚,其中《红雨楼文稿》中经郑杰、陈寿祺收藏,存八册。陈寿祺云:

《红雨楼文稿》八册,明吾乡徐兴公著。中多手迹题上,每别识“选”、“不”,盖未定本也。君《鳌峰集》诗,南巡抚居益为之授梓,未几,南公去位,以属同知摄建安令郑某,仅刻四卷而辍。后自鬻田续成十册。其杂文三十余卷,删为二十卷十四册,无力杀青,常求助于故人,卒不果。其书遂佚不传。余近始得《鳌峰集》近体诗四卷,文即此本。补缀蠹蚀,盖已亡其半矣。<sup>①</sup>

晚近陈衍见到的《红雨楼集》也是八册:

钞本八册,约可分十余卷,似系未定稿。间有圈点,多勾去不存者。尺牍居十之八九,祭文居十之一,杂文居二十之一。前后无序跋《目录》。尺牍中,与曹能始、谢在杭、林茂之诸人居多。《硯来圭绪录》云:“徐兴公未梓文八卷,藏陈恭甫先生家。其文如布帛黍粟,孺然孝子悌弟之言,于家庭间言之尤真挚。”似即八册钞本。然八册者无诗。余曾见钞本,不全。<sup>②</sup>

《红雨楼集》,即陈寿祺《跋》文所述之《红雨楼文稿》。陈寿祺、林昌彝、陈衍目击,均为八册。上海图书馆所藏《红雨楼集·鳌峰集文集》共十二册<sup>③</sup>,前八

①陈寿祺:《红雨楼文稿跋》,《左海文集》卷七,道光刊本,第54页a。按:此文说“杂文三十余卷”,而徐爌本人则有三十余卷、五十余卷、六十卷数种说法。

②《石遗室书录》,《福建通志·艺文志》卷六十三引。

③陈寿祺所见徐爌杂文尚有十四册,上海图书馆所藏《红雨楼集·鳌峰集文集》仅剩下十二册,疑流传过程中遗失其中两册。

册“尺牍居十之八九”，九至十二册无尺牍，因此，我们推断，《红雨楼集·鳌峰集文集》的前八册，就是二陈所经眼之八册；而《红雨楼集·鳌峰集文集》后四册，则为《鳌峰文集》。

由于年代久远，稿本原本没有页码，又几经易手，收藏者在重装时，编排无序，如作于徐燊生命最后一年的崇祯十五年(1642)数通，分装在《红雨楼集·鳌峰集文集》册四和册五，而册八最后两通《复裴翰卿》和《答曹能始》，则分别作于天启七年(1627)和天启五年(1625)。装订偶也发生错页的情况，如册四第302页《寄张(怙)[岵]梅》至“仰惟鸿造”四字而止，文意不完整，可能是残篇。同册第91页“始终扶植”以上缺文，看似也是残篇，经反复比对，“仰惟鸿造”下接“始终扶植”至篇末，便成完帙。因此，两个残篇归并之后，只能算是尺牍1通。经过反复核对，我们统计出《红雨楼集·鳌峰集文集》册三至册八共六册所载尺牍，计742通(含各自独立的残篇)。其中册四《留侯邑来父母上院道启》，应归入“启类”，滥入此册；册五，第167-168页《答张烺叔》(落款为“五月廿四日”)，与同册第158-160页《答张烺叔》(落款为“五月廿五日”)重复。“五月廿四日”一通与“五月廿五日”一通，前半幅仅个别字有异；“五月廿五日”一通后半“日前魏倩老”至“商之倩老如何”，“五月廿四日”一通无。疑“五月廿四日”一通为初稿。册六，第368-369页《与施大将军》与同册第421页《复施元戎》重复，唯文字小异，题“与”作“复”，文“此中”作“此衷”。扣除这三篇，今得兴公尺牍739通。

调查尺牍的篇数之后，紧接着的工作是考订各篇尺牍的作年。兴公尺牍只有极少数落款有月、日，极少数有干支。可以参证的文献是：刊本和抄本《鳌峰集》，然而刊本《鳌峰集》止于万历四十八年(1620)，抄本也只有崇祯七年至九年(1633-1635)三年的诗作；题记序跋和其它杂文；文友的诗文和事迹。作年的考订，很难做到739篇都绝对准确，特别是残篇的推断，可能会有出入，但是应该说，绝大多数考订，都言之有据。在对739篇尺牍作年逐一考订的基础上，我们进一步统计了徐燊各年所作尺牍数。制表如下(由多到少排列)：

| 尺牍件数 | 年份   | 尺牍件数 | 年份   | 尺牍件数 | 年份   | 尺牍件数 | 年份   | 尺牍件数     | 年份  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|
| 75   | 1640 | 22   | 1625 | 11   | 1608 | 4    | 1604 | /        | 1620 |
| 70   | 1636 | 21   | 1613 | 10   | 1611 | 3    | 1605 | /        | 1622 |
| 66   | 1641 | 21   | 1634 | 8    | 1602 | 3    | 1616 | /        | 1629 |
| 43   | 1635 | 17   | 1628 | 7    | 1607 | 3    | 1619 | /        | 1630 |
| 38   | 1627 | 15   | 1612 | 7    | 1609 | 3    | 1623 | /        | 1631 |
| 35   | 1639 | 15   | 1614 | 7    | 1617 | 2    | 1603 | /        | 1632 |
| 34   | 1615 | 14   | 1621 | 6    | 1598 | 1    | 1597 | /        | 1633 |
| 30   | 1642 | 13   | 1601 | 6    | 1624 | 1    | 1599 |          |      |
| 27   | 1638 | 12   | 1595 | 5    | 1592 | /    | 1596 |          |      |
| 26   | 1626 | 12   | 1600 | 5    | 1593 | /    | 1606 | 历年合计:739 |      |
| 24   | 1637 | 12   | 1610 | 5    | 1594 | /    | 1618 |          |      |

此表起始于万历二十年(1592),徐爌二十三岁,止于崇祯十五年(1642),徐爌七十三岁,前后计五十一年。最多的一年(1640)有75通;万历二十五年(1597)等十个年份为0通。如果我们没有作这个统计,按照常理推测:作者晚年尺牍的流传应该比早年多,作了这个统计之后,这一常理性的推测只部分符合事实,即晚年确实流传比较多,崇祯七年(1634)至崇祯十五年(1642)这九年,每年都有20通以上传世,合计391通,占到全部流传数的53%。0通的十个年份,万历二十年(1592)至万历三十年(1601)这十年间,只有万历二十年(1624)一个年份为0通,而万历二十三年(1695)和万历二十八年(1600),各有12通流传至今。0通的年份集中在崇祯二年(1629)至六年(1633)间,连续五年。这说明:第一,徐爌从年轻起就有意识保留自己尺牍的底稿;第二,年代久远尺牍丢失较多,也是正常的,但不是越早丢失越多;第三,1629-1633这五年的尺牍应当是在流传过程中整册丢失。

我们还统计了尺牍收件人的人数和每位收件者的篇数。尺牍中,收件人有时是名、有时是字号,有的收件人的字号还不止一个;收件人有时是官职,但是官职也有不同的称呼,也会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。如邵捷春,有时称肇复(字),有时称见心(又字),有时称剑津(号);沈弇丘,即沈鼎科,弇丘为其字,但有时又称沈建阳,鼎科为建阳县知县;施德政,字正之,有时称其为施元戎,有时称施大将军;谢国,又名弘仪、弘义,字简之,号寤云,有时称其为谢元戎,有时称谢寤云大将军。经过细核,统计出739通尺牍,共有收件人352人(残件无法判断收件人不计;一通书信有两位以上收件人只计前一位),列表如下(收件人5通以上者,由多到少):

| 通数 | 姓名字号             | 里籍 | 通数 | 姓名字号               | 里籍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19 | 李竣,字公起           | 鄞县 | 6  | 何望海,字金阳,又字若士       | 邵武 |
| 14 | 屠本峻,字田叔          | 鄞县 | 6  | 黄若璠,字字珍            | 建安 |
| 13 | 张燮,字绍和           | 龙溪 | 6  | 施德政,字正之,号云石        | 太仓 |
| 11 | 曹学佺,字能始          | 侯官 | 6  | 王士誉,字永叔,号马石        | 桃源 |
| 10 | 王志道,字而宏,号东里      | 漳浦 | 6  | 吴仕训,字光卿            | 潮阳 |
| 9  | 邵捷春,字肇复,又字见心,号剑津 | 闽县 | 6  | 谢国,又名弘仪、弘义,字简之,号寤云 | 会稽 |
| 9  | 喻应夔,字宣仲          | 新建 | 6  | 章自炳,字岵梅            | 兰溪 |
| 9  | 张大光,字叔弢          | 长溪 | 5  | 陈文煊,字子潜            |    |
| 8  | 林古度,字茂之          | 福清 | 5  | 何乔远,字穉孝,号匪莪        | 晋江 |
| 8  | 杨德周,字南仲          | 鄞县 | 5  | 江禹疏,字中散,一字伯通       | 桃源 |
| 7  | 王穉登,字百谷(谷)       | 长洲 | 5  | 裴翰卿                | 清溪 |
| 6  | 陈冲虚              | 侯考 | 5  | 盛民衡,号桂海            | 曲阳 |
| 6  | 陈贞鉉              | 漳州 | 5  | 武夷山道士              |    |

(续表)

| 通数 | 姓名字号      | 里籍       | 通数 | 姓名字号        | 里籍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|----|
| 6  | 崔世召,字征仲   | 宁德       | 5  | 许彖,字玉史,又字玉斧 | 侯官 |
| 6  | 高元浚,字君鼎   | 海澄       | 5  | 颜继祖,字绳其,号同兰 | 龙溪 |
| 6  | 何模,字平子,楷弟 | 晋江籍,镇海卫人 | 5  | 杨能玄         | 同安 |

此表显示,徐燊尺牍收件人5通以上,共32人。陈衍说,尺牍以曹学佺、谢肇淛、林古度居多。这一判断并不准确,如果说曹学佺、林古度较多,则比较圆融,分别是11通和8通,为第四位和第九位。而谢肇淛则只有4通,在32人之后。这样的统计有不公平的一面,更不能作为交往疏密的唯一依据,如有的人去世的年份较早,如邓原岳(4通),卒于万历三十二年(1604),而曹学佺等在邓原岳卒后仍然在世数十年;徐燊虽然和曹学佺交往的时间很长,但同城而居,尺牍往返未必那么需要;还有某些年份尺牍的遗佚,也影响数字统计的精确。但是,徐燊与李埈、屠本峻等的书信往来比较稳定,则是可以肯定的。书信往返的对象,大致情况是:一,社友,如曹学佺、邵捷春、邓原岳等都同为福州人,但只有当他们外出作官时才有书信往返。二,地方长官或将领,或在任、或离任的书信往返。三、临近省份的文友,集中在江浙、江西,这些文友大多是徐燊游历时所结识的;四、本省的其它朋友,以建州、漳州居多。建州因徐燊常有购书和刻书之役,往返次数最多,累计逗留时间最长;徐燊到漳州访友的次数也多些,漳州以张燮为中心的霞中诗社活跃一时,再加上张燮辑刻《七十二家集》,规划辑刻《山志》、《唐七十二家集》,两人共同话题较多。这里应当特别提到的是与福建近临的江浙、江西,邮路相对比较便捷,往来人员可充当邮使,这也是与这些地域文友书信往返较多的重要原因。

二、尺牍与诗文互证及诗文之订补

笔者在撰著《徐兴公年谱长编》过程中,尺牍、诗、题词序跋及其它杂文是最基本的文献资料。尺牍与诗、题词序跋及其它杂文的互证,谱主的生平行踪可能更加明晰,年谱的内容可能更加丰满。

《寄许灵长》、《寄闻人半刺》、《寄胡御长》是《文集》排列在最前边的三通尺牍,也是现存兴公作年最早的尺牍:作于万历二十年(1592)。这年六月,徐燊往吴求王穉登、张献翼等为亡父作传及铭文,往返两过钱塘,访新旧文友:许光祚,字灵长,钱塘(今杭州)人;胡御长,钱塘人。闻人半刺则于市中邂逅;半刺,字仲玘,姚江人,此前曾官泉州,与兴公早已结识。《游吴记》记载了他们的会面及游遨:

(七月)廿一日,至钱塘江口……进钱塘门,卸行李旅邸。钱塘胡生御长来顾余,余且约为西子湖之游。然余既苦于舟车水陆之劳,邸中伏枕对

客,几不能支。两高三竺,订以异日。廿三日,胡生复来邀予口吴山。吴山,杭州镇山也。余力疾与胡生往。从伍相口而进……复拆入三茅观,礼茅君,而出观前,复闻读书声。胡生导予入一室,乃许生灵长别业也。一见如平生欢,两相赏识,顾问予远游状,赋诗为赠……(八月)十九日,入武林门。游武林,市中邂逅闻人半刺仲玠。仲玠,姚江人,向官温陵,与余友善。兹挂冠归,携家隐于西湖,遂约为西湖之游。次日,賁酒脯,买小莲叶,与朱山人、胡文学过昭庆寺。<sup>①</sup>

“赋诗为赠”,即《过三茅观访许灵长秀才读书舍》:“为寻道院觅高踪,踏遍吴山第一峰。竹径乍飞云几片,柴门长掩翠千重。”<sup>②</sup>徐燊又作《游吴山紫阳洞同许灵长胡御长》<sup>③</sup>,亦是赠诗。是岁冬,谢肇淛赴湖州司理任,徐燊托其充当信使,捎去致许、胡、闻人三书。《寄许灵长》云:“不肖返棹钱塘,走吴山,寻足下踪迹,乃足下在江村刈获,遂不得一再把臂。与仲玠诸子醉西子湖头,辄思玄度人生欢会,宁可常乎。”<sup>④</sup>此则说由吴东归过钱塘,再寻许氏踪迹,不遇,遇闻人半刺,遂一醉湖畔;偶遇闻人半刺,又见上引《吴游记》。《寄胡御长》云:“两过武林,谈心把臂,他乡骨肉,异姓弟兄,孔、李之谊既笃,管、鲍之契尤深。”<sup>⑤</sup>再过武林,即《吴游记》所云与“賁酒脯,买小莲叶”,与胡氏等过昭庆寺。《寄闻人半刺》云:“过武林者再,而足下恋恋故人,把臂欢甚。”<sup>⑥</sup>亦可与《吴游记》相印证。许光祚于万历二十八年(1600)举于乡,万历四十二年(1614)任宣城司理,同郡郑泂往宣城,徐燊作《寄许灵长司宣城》云:“江鱼塞雁两无情,廿载音书杳寄声。”<sup>⑦</sup>《寄许灵长司理》则云:“忆吴山一再把臂,邈若河汉。岁月悠悠,忽淹二纪,人生欢会,宁可常哉”<sup>⑧</sup>。自万历二十年(1592)把臂,至今已历二纪。尺牋与诗可以互证。

天启元年(1621)之后,《鳌峰集》没有续刻,徐燊后二十三年的诗歌创作,除了七律抄本和散见在曹学佺、张燮等人的集子残留极少的佚诗外,情况基本不明。但是,我们从其尺牋中,可以多多少少了解一些线索,以天启元年这一年为例,《答屠田叔》:“小诗题扇求政。”《寄苏石水开府》:“漫成小诗二律,题之扇头,聊布寸衷。”《答朱康侯王孙》:“辱惠佳篇,读之神王,勉尔効顰,题之扇头请正。”《寄伯隄宗侯》:“以扇头佳什,沐如清风,花晨月夕,一讽一吟,则高怀雅韵,宛在目前,益厘美人之思耳。漫次严韵,题之扇头求政。”《寄安仁宗侯》:

①徐燊:《吴游记》,《文集》册九,《上图稿本》第44册,第392-396页。

②徐燊著,陈庆元、陈炜编著:《鳌峰集》卷十三,广陵书社,2012年,第345页。

③徐燊著,陈庆元、陈炜编著:《鳌峰集》卷十,第176页。

④《文集》册三,《上图稿本》第42册,第261页。

⑤《文集》册三,《上图稿本》第42册,第263页。

⑥《文集》册三,《上图稿本》第42册,第262页。

⑦徐燊著,陈庆元、陈炜编著:《鳌峰集》卷十九,第578页。

⑧《文集》册六,《上图稿本》第43册,第375页。

“展读雄篇，朗秀类其为人，用次严韵奉答……兹并《海错疏》、曹石仓近草致上。”《寄甲源宗侯》：“向成小律，无繇寄呈，兹因友人蓝任夫之便，附通记曹。”<sup>①</sup>据以上尺牋，我们知道徐燊此岁至少还作有《寄屠田叔》、《寄苏石水开府二首》、《寄朱康侯王孙》、《漫次伯堤宗侯韵》、《漫次安仁宗侯韵》、《呈甲源宗侯》（题均为笔者所拟）等诗。

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，徐燊与兄徐燊等社友分别作《闽王墓》诗，后来，有权要说闽王之事无作诗必要。天启七年（1627），徐燊致书叶向高，以为蜀人可歌汉帝，越人可歌钱王，为什么闽人不必作闽王诗？向高回书并作诗，徐燊《复叶相公》：“承示大篇，夜光夺目，谨和《王墓》二律，请正。不自知其固陋也。”<sup>②</sup>“《王墓》二律”，已佚，我们试代拟一个诗题：《和叶相公闽王墓二律》，庶几近之。向高又作六首示燊，燊另一通《复叶相公》：“承示《王坟》六章，结构愈密，炉锤愈工，匠手匠心，当代鲜两。不揣僭和如数，瓦缶不敌黄钟，心自知矣。敬录请正。”<sup>③</sup>“僭和如数”，我们也代徐燊拟一个诗题：《敬和叶向公闽王坟六首》。从这两通致叶向高的尺牋，我们知道，徐燊此年作有《闽王墓》诗二题八首；又知道叶向高致徐燊书信及诗虽然已佚，但叶氏不仅非常赞同《闽王墓》诗可作的观点，而且亲自操刀，作诗八首以支持徐燊。

徐燊佚诗的搜集<sup>④</sup>，可以做的工作可能比较有限了，但是700多通的尺牋，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纂辑徐燊诗佚题的可能。从兴公尺牋和诸诗友的诗文集，粗略预计，可辑得上百题的佚诗之题。诗歌佚题的辑录，有助于我们对徐燊诗的深入探讨和研究。

徐燊一生著述甚富，研究者订补徐燊著录正在日趋完备。尺牋中还有一些线索，值得注意。《答王元祯》：“外有《隐居放言》五卷，抄录求正。稗苑中不识可附骥尾否？中多不雅，祈大笔一为改削，寔荷无涯之赐矣。”<sup>⑤</sup>王元祯有《乌衣佳话》寄徐燊，燊抄所著说部《隐居放言》五卷，希冀元祯能考虑授梓。尺牋所言徐燊所著《隐居放言》，未见他书著录。

徐燊编《三友墓诗集词文》，见《荆山徐氏谱》，他书未著录。《三友墓诗集词文》，究竟编于何年？徐燊《三友墓祭扫约言序》作于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，知是集最初编辑不晚于此年。其实，这部诗文集编辑的时间很长，系陆续刻补而成。天启五年（1625），《致李公起》：“承大笔为先人作《三友墓铭》，百年松楸，大为生色。此情此谊，如何可爰，正谋续梓，未就。徐当寄上。”<sup>⑥</sup>此年李峻作

①分别见《文集》册七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4册，第24-26页、26-27页、29-31页、32-33页、33页、33-34页。

②《文集》册八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4册，第298页。

③《文集》册八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4册，第300页。

④徐燊佚诗辑，见徐燊著，陈庆元、陈炜编著：《鳌峰集》，广陵书社，2012年。

⑤《文集》册六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3册，第308-309页。

⑥《文集》册八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4册，第186页。

《三友墓铭》便是一证。天启六年(1626),《答徐孝则》:“又口以《三友》佳传垂之不朽。每春秋伏腊,一拜松楸,辄口仁兄高情厚谊如山岳之重耳。谢岂言喻哉!”<sup>①</sup>此年徐申干作《三友传》又是一证。天启七年(1627),《复叶相公》:“曾王父掩骼一丘,荷相公大人锡之琬琰,以阐幽光,白骨可肉,黄壤犹生。不肖某行当勒石坟前,用志不朽。弗独二姓云孙拜松楸读而增感,即当年三友口且含笑于九泉矣。”<sup>②</sup>此年叶向高再作《三友诗》,也是一证。

### 三、协编曹学佺《明诗选》、《明初文选》细节

徐爌与曹学佺关系最为密切,一生中交往超过五十年。曹学佺为南廷尉时,招徐爌入署;徐爌住了将近一整年的时间。曹学佺游宦西蜀、粤西,多次招其前往,由于诸事牵挂,未果。天启七年(1627)曹氏从粤西遭严谴,归乡之后,与徐爌共主闽中文坛长达十五六年。崇祯五年(1632),曹学佺在古田困关建别业,年年不间断地往返于会城与困关之间,曹学佺日常与外界的联系,相当一部分的日常事务,都由徐爌代其安排,如求字、乞序、寿庆吊问等等,减少了曹学佺的许多烦杂事务。徐曹之间的友情,很值得讨论。本节仅拟从尺牍入手,对徐爌如何协助曹氏编选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《明初文选》,钩沉一点具体细节。

曹学佺从粤西归来,致力于著述,完成了《天下名胜志》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和《国初文选》(《明初文选》)等巨著。徐氏藏书甚富,曹学佺诗文选的编纂得力于此,徐爌孙钟震说:“曹能始先生选梓《儒藏》《十二代诗》,其所未见书,咸出大父藏本,而宋、元集尤为有功。”<sup>③</sup>“宋、元集尤为有功”,恐怕是就优良版本说的。徐爌如若外出远游,只要其子孙未侍从,曹学佺随时都可以到他家里借书使用,除了一个“借”的过程,和自己的家藏书几乎没有两样。我们注意到了《徐氏家藏书目》,这个书目,在明代别集方面,是分省分府编排的,曹学佺《明诗选》有数百卷也是分省分府编排的,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,可能他们之间有过讨论。既然书目是分省分府编排的,使用起来便相当便利,必然加快编选的速度,且减少不必要的差错。

为了叙述方便,我们制作了徐爌协助曹学佺编《明诗选》简明表:

| 作者书名    | 时间           | 方式 | 根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浦源《浦源诗》 | 万历三十五年(1607) | 选辑 | 徐爌《浦源诗跋》:“舍人所著诗多轶弗传。爌辑诸家所选者为一卷,淘沙拣金,业已见宝,自不必连篇累牍也。”(《石仓十二代诗选·明诗一集》卷之十七林鸿《缙部集》卷附《浦源诗》) |

①《文集》册八,《上图稿本》第44册,第208-209页。

②《文集》册八,《上图稿本》第44册,第301页。

③徐钟震:《先大父行略》,《雪樵文集》不分卷,稿本。

(续表)

| 作者书名       | 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方式       | 根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林景清《竹窗小稿》  | 天 启 三 年<br>(1623)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选录       | 徐爌《竹窗小稿跋》：“予乃选其雅驯者录为一帙，以见先生之高标逸韵未泯于今也。”曹学佺《李梅庵陈蔗轩林竹窗诗跋》：“竹窗则有全集。兴公既哀选之，予再加删润，合为一帙。”（《石仓十二代诗选·明诗次集》卷七十八李叔玉《梅庵集》附林景清《竹窗小稿》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郭  廔《镜湖清唱》 | 崇  祯  三  年<br>(1630)                   | 抄录<br>考证 | 徐爌《镜湖清唱跋》：“予既录其遗编，并为考其地里，付曹君能始授之梓，敬夫之名从此弗至湮没。”（《石仓十二代诗选·明诗次集》卷七郭廔《镜湖清唱》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国初处士诗      | 时间不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校定       | 曹学佺《石仓十二代诗选·明诗一集》卷之八十《国初处士》卷端：“后学曹学佺阅、徐惟起较。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廖世昭《越坡稿》   | 崇  祯  五  年<br>(1632)                   | 选录       | 徐爌题《越坡稿》：“爌家藏先生手录诗一卷，字法苍劲，恒爱宝之。近曹能始选梓《明诗》，乃录而附于《陈东槐堂集》之后。”（《新辑红雨楼题记》，第162页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江盈科《雪涛集》   | 崇  祯  八  年<br>(1635)                   | 搜集       | 徐爌《寄江伯通》：“拜尊大人《雪涛集》。敝社兄曹能始观察如获至宝，业已拔其尤者，刻《明诗选》中。”（《文集》册三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2册，第384-386页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佚名         | 崇  祯  九  年<br>(1636)                   | 搜集       | 徐爌《缺题》：“鸿便希乞垂教。并惠旧刻一部，盖曹能始先生方选《国朝诗》，尚候大篇压卷。”（《文集》册四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3册，第2页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杨能玄诗       | 崇  祯  九  年 / 十<br>二  年 (1636/<br>1639) | 提供       | 徐爌《答杨能玄》：“能始先生选《明集》，泛滥之极。尊兄既托叔度，又有稿资，必能为力也。”（《文集》册四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3册，第26页）《答杨能玄》：“能始先生选《明诗》，泛漫无统，又无捉刀人扶助，至今未行。尊作容致之，当効区区也。”（《文集》册四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3册，第121页） |
| 蔡熙阳诗       | 崇  祯  十  一  年<br>(1638)                | 搜集       | 徐爌《寄蔡熙阳元戎》：“敝友曹能始观察，年来编辑《十二代诗选》，而本朝尤盛，老祖台向见教诸集，业已付之授梓行世。”（《文集》册五，第43册，第214页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冒起宗及其父诗    | 崇  祯  十  一  年<br>(1638)                | 搜集       | 徐爌《寄冒嵩少》：“能始选梓《十二代诗》，太翁老先生及佳作俱已刊行，然淮海英灵收之未尽。”（《文集》册五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3册，第212页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(续表)

| 作者书名     | 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方式 | 根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吴梦旸诗     | 崇祯十二年<br>(1639)         | 搜集 | 徐爌《寄茅孝若》：“能始锐意选诗，而于我朝广搜，于朋友尤置力。吴允兆先生集，闽地绝无，既属高谊杀青，必有副本，乞寄二部，一予能始，一予不肖。”（《文集》册四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3册，第38页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赵士骏及其父之诗 | 崇祯十二/十三年<br>(1639/1640) | 编选 | 徐爌《复赵西星》：“尊翁诗并佳什，弟归即付曹先生，业已选梓竣事矣。”（《文集》册五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3册，第221-222页）又《复赵西星》：“尊公诗章并仁兄佳作，曹能始久已选梓行世。今单印二册奉览。”（《文集》册四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3册，第75页） |
| 陈文煊及其父诗  | 崇祯十三年<br>(1640)         | 刷印 | 徐爌《又〔寄陈子潜〕》：“曹尊老已选佳作入梓，计二十余叶，今俟竣工，即同尊大人诗一并印呈”（《文集》册四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3册，第145页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李垞及其父    | 崇祯十五年<br>(1642)         | 刷印 | 徐爌《寄李公起》：“曹能始踪迹多在困溪，去会城二百里。书板芜杂，承委口印尊公诸刻，一时莫能取出。”（《文集》册五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3册，第203页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从此表我们可以看出，徐爌协助曹学佺编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有下列几种情形：

第一，曹学佺《明诗选》序作于崇祯三年（1630），此时《明诗一集》，即洪永之世诗已经编就。曹学佺直接利用徐爌早年已经搜集之本或整理本，将其收入《诗选》，如浦源《浦源诗》、林景清《竹窗小稿》、郭厘《镜湖清唱》。以类相从的《明初处士诗》，则是两人共同讨论选辑的成果。

第二，大约在崇祯八年（1635），曹学佺编万历间诗，徐爌联系健在的作者或者作者的后人，广泛地搜集诗集，经过初选和初编，提供给曹学佺授梓。有时是作者自己找上门送来书稿。上表中有两通致杨能玄尺牍，前一通谈到杨氏通过叔度（陈鸿）与曹学佺联络，还给了叔度一点酬劳；大概叔度无能为力，杨氏又找到徐爌。后一通，徐爌说，自己一定会效力。徐爌的意见无疑比陈鸿更加重要，曹学佺采纳的可能性更大些。

第三，选诗授梓之后，徐爌还协助作者刷抽印本，装订成单册（有类于今天的“样书”），寄送给作者或他们的后人。这是选诗授梓的后续工作，其性质相当于今天的“编务”。

曹学佺选辑《国初文选》（《明初文选》），徐爌曾说过他参与雠校（详下），据此类推，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徐爌也当参与雠校。既然徐爌协助作者刷抽印本，

也应参与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的授梓工作，跑书坊，结算印资。《寄李公起》略云：“曹能始刻诗，已分各省各府。今冬可完，当购楮总印全集，计百余册，则二百七十年文献，犁然具在也。”<sup>①</sup>此尺牍作于崇祯九年（1636）。徐爌对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工作进度了如指掌，何时完工，分量大体多少，何时授梓、购楮总印，非局内人不可能了解得如此周详。崇祯八年（1635）徐爌谋刻书，在建州住了将近一年；崇祯十年（1637），到建州两个月；崇祯十四年（1641），又待了半年。前两次没有明文记载刻何书，崇祯十四年这一次，为往刻《明文》而行：“前带《明文十家》，托建阳令代刻，此公收去，全无意助一臂之力，兄当作一书领回可也。建令言多虚诞，不能靠耳。”<sup>②</sup>建阳令，即黄国琦，字石公。黄国琦靠不住，徐爌致函向其索回书稿：“去岁曹能始命某携《明文》十册，烦付书林代梓，知书户辈无刻资不肯捉刀，已情告能始先生矣。其原稿，倘有役便，祈封付下，听其自梓为便耳。”<sup>③</sup>

凭藉徐曹的关系，徐往建州为曹刻书，既有《明文》，又有《十二代诗选》，都是无可怀疑的。在刻书的过程中，也发生过经济纠纷。崇祯九年（1636），徐爌有致赵慧生尺牍四通，其中一通云：

若得归结所许前约，幸乞早完。弟一年客建，只有此事与曹公均分，而曹公亦日望不浅，如弟者，更如饥渴之待饮食耳。大美、文心二铺，时时便有便鸿，幸乞相闻，以便耑人拜领也。<sup>④</sup>

“一年客建”，指崇祯九年（1635）之行；“大美、文心二铺”，当为二书坊名。其余三通，也有两通谈到款项之事。至于纠结的缘起、过程，都不得而知。既然是与书坊有关，如果不是刻资，就是卖书之款。而且，此番纠结，是以徐曹为一方，书坊为一方，徐曹利益相关。

此小节结束之前，让我们再看看兴公尺牍对曹学佺选《明文》的记载：“曹公方今先了《诗选》，明岁欲选《明文》，则当奉邀校讎，兹尚未敢定也。”<sup>⑤</sup>此篇尺牍作于崇祯九年（1636），“先了《明诗》”的“明诗”，当为《明诗》前六集，上文我们说过这一年之后，《明诗》的其它部分尚未结束。《明文》的编辑，始于崇祯十年（1637）或稍晚，初步议定，徐爌参与校讎。到了崇祯十二年（1640），“国朝名文，洪永之世已梓三十家”；次年，《明文十家》十册发往建阳，拟先授梓，然而未果。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终于刻成，徐爌已经看不到了。1956年郑振铎从琉璃厂购天一阁藏本《石仓历代文选》<sup>⑥</sup>（又称《石仓国初文选》），当即此本。

①《寄李公起》，《文集》册四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3册，第16页。

②《寄能始》，《文集》册五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3册，第273页。

③《复黄石公》，《文集》册四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3册，第68—69页。

④《寄赵慧生》，《文集》册七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4册，第63—64页。

⑤《答陶嗣养》，《文集》册七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4册，第127页。

⑥郑振铎《西谛书跋》“石仓历代文选二十卷”条，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210页。

#### 四、家事与乡里琐事

兴公尺牍是留底稿本,未加去取,无论大事小事,都得以存留在文字中。700多通尺牍不能不涉及到家庭及乡里琐事,陈寿祺以为大多有关“伦理纲常”<sup>①</sup>。说“伦理纲常”,大抵不错,但尺牍涉及其范围可能还要更广些。

尺牍中谈到的家庭之事,大一点有万历四十一年(1613)在祭酒岭为父母下葬之事。徐燊致陈翼飞书云:“先人弃诸孤二十有五(按:五为三之讹)年,不肖贫不能襄葬。岁底支干大利,不得不假贷以营窆窆,入山两月,化者既安,而生者仅存皮骨耳。”<sup>②</sup>此书可与《祭酒岭造坟记》一文相印证。

兴公尺牍记载了其妻的卒年,子徐陆的生卒年,季子延寿、孙钟震、曾孙汝宁的生年,诸儿孙入泮、参加童试、省试的种种情况,亦有资考证。

徐燊姐适肇瀚父谢汝韶为继室,谢肇瀚虽然年长于徐燊,但在名分上,则为徐燊之甥。谢肇瀚与徐燊兄弟为诗文同道,关系密切。谢肇瀚仕途还算顺畅,官至粤西左布政使,谢肇瀚卒后,徐燊为撰《中奉大夫广西左布政使武林谢公行状》,并致曹学佺书曰:“在杭《行状》,弟为之,生平心地极好,尽淹博可师。但于睦族、结客、布施行好事,锱铢未能割舍,故弟备述其概,而此三件事,未敢曲笔也。”<sup>③</sup>此通尺牍与《行状》,大致反映了徐燊对谢肇瀚的基本看法和评价。

徐燊先后的家相,其中一位叫王有成。王有成识字,能拓碑刻,为左右手:“弟入春数日,适小仆王有成者物故,上有七旬父母,下有一妻一媵,杳无嗣续,身后之累,难于区画。此仆幼侍左右,一旦云亡,如失股肱,不胜伤悼。”“一小力自幼侍弟笔砚者,久为之婚聚,今春倏尔夭逝,即能搨碑之仆,弟失左右手,言之可悼耳。”<sup>④</sup>王有成卒于崇祯九年(1636)正月,徐燊尺牍多次言及。从中可见徐燊选用仆从的一些情况。

徐燊捐弃,这一年徐庄十五岁,“犹子不免负薪之困”<sup>⑤</sup>。当年,徐燊对这位尚未成年的侄儿很同情,更谈不上恶意。但是过了没几年,徐庄成年后,竟拆祠龛卖钱,把徐燊的《幔亭集》版也典当给他人,甚至扶其母诉讼徐燊和徐燊。在很长的一个时期,徐燊对徐庄颇为厌恶,骂其为“逆侄”,加以痛斥,上文已略有叙及。徐庄约生于万历十三年(1585),徐燊之长子,如果事情止于其二三十岁时卖龛、诉讼,我们对徐庄的印象肯定不佳。不过,尺牍中也多少载述徐庄四十岁之后的行迹:“弟、侄皆青衿,足以支持。”<sup>⑥</sup>“小孙、舍弟、舍侄,俱考三

①陈寿祺:《红雨楼文稿跋》,《左海文集》卷七,第56页b。

②《答陈元明明府》,《文集》册六,《上图稿本》第43册,第366—367页。

③《答曹能始》,《文集》册八,《上图稿本》第44册,第305页。

④《寄陶嗣养》,《文集》册七,《上图稿本》第44册,第62—63页。

⑤《寄屠田叔》,《文集》册三,《上图稿本》第42册,第324页。

⑥《答林茂之》,《文集》册七,《上图稿本》第44册,第54页。

等”<sup>①</sup>，以上两处“侄”，是否包括徐庄，还是单指徐燧之子，没有把握。“幔亭先兄所生舍侄，年逾四旬，稍能自立，已生二侄孙”<sup>②</sup>，徐燧对徐庄的印象有所改变则是事实。徐燧与其侄庄的交恶，徐庄告徐燧状，到底什么原因？徐燧这一方，有没有欠缺或处理不当之处？按我们推测，可能有财产经济上的纠纷。徐棉卒后，长子徐燧掌管家政，徐燧卒时，徐庄虽然是徐棉的嫡长孙，但是只有十五岁，这个家只能由徐燧来操持。拆龛卖钱那会儿，徐庄已经二十五岁左右，也有可能以嫡长孙之名分要回财权。徐燧生前散财结客，徐燧对此本来就很不满，因此也就不大可能把家政大权交给徐庄。也可能在此前后，分割家产，由此产生纠纷。徐燧卒后，徐燧诗文尺牍不再提到红雨楼活动，此楼为徐棉所建，也可能此楼遂归徐庄所有。绿玉斋是徐燧生前所建，此斋是兄弟的书斋，且为以诗文会友之处，则归徐燧所有，徐燧在绿玉斋活动有大量诗文为证。再次，徐棉、徐燧遗留下来的大量图书字画，都归了徐燧<sup>③</sup>，徐燧有没有给徐庄合适的补偿？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从早年痛斥徐庄，到晚年对徐庄渐次的肯定，叔侄从交恶已经趋向修好，徐燧对待徐庄的态度有了较大改变，可能经济方面的矛盾也有所缓和。

徐燧与乡里间或也有经济纠纷。徐燧和周之夔有四十年的交情，崇祯五年(1632)，之夔六弟纳甫从徐燧处借百金，其间只收得崇祯六年、七年两年之息，到了崇祯八年(1635)则连息也化为子虚乌有。至崇祯十年(1637)，按市俗利息，本利共160两。当初纳甫借用，以周之夔急用为由，云：“据纳甫前柬云云，全为兄纳会当户之用，非如此说，弟宁肯轻贷于纳甫耶？盖弟素敬信于兄，贷纳甫者，亦所以贷章甫也。”<sup>④</sup>所以，徐燧请之夔出面了断，或责成纳甫先还数十金，以应目前倒悬。五六年间，借100两，本利共160两，扣除纳甫还过两年息，民间借贷利息年利在百分之二十左右，这是“世俗”的约定；徐燧与周氏的约定或不至于这么高。

周之夔兄弟六人，长兄已经七十有三，次兄、三兄也都过了花甲，兄弟之间闹了矛盾，徐燧作书致周之夔，动之以情，晓知以礼，道：“外议自缙绅士庶，无不谓兄之不能相容”。周之夔，字章甫，闽县人。崇祯四年(1631)进士，为苏州司理，弃官归。徐燧说：“兄自做秀才时，谦抑温恭，事兄如父，弟爱之重之，非

①《寄喻宣仲》，《文集》册八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4册，第290页。

②《寄李芾泉明府》，《文集》册七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4册，第56-57页。

③徐钟震《答借书》：“先人生平他无嗜好……积遗篇不下数十万卷。缥緗购于市肆，贫则典衣，铅槧亲自较讎，老而弗倦。某等捧兹手泽，愈心伤敬，什袭以珍藏，毋敢陨越，恐取携之任意，以速愆尤……如有借观，概不从命。”（《雪樵文集》不分卷，稿本。）徐燧卒后藏书归钟震所有，至少是最主要的所有者，才有权力作出如此决定。长子陆早卒，陆独子钟震是徐燧长孙，故得以继承藏书。由此看来，徐棉卒后，藏书归长子徐燧；徐燧卒后，藏书理应归长子徐庄，也是理所应当。

④《与周章甫》，《文集》册八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4册，第227页。

一日矣。兹以小忿，遂致参商，似乎不雅。况已登第，实足亢宗，皆宗祖数百年积德，始陶铸出一个进士，岂容易致身哉！”接着又引用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论》、《孟》等古训点醒之：“兄满腹文章，满腹经纶，愿兄学古人行径，以养和平之福。”或许由于畏惧周之夔的地位，“诸友丛集，未敢直言相劝”<sup>①</sup>，而徐燏却直言奉劝，友直友谅，由此可见出性格的直爽鲠直。

邓庆棠，邓原岳之子。原岳，字汝高，万历二十年(1592)进士，官至云南学使。庆棠，字道协，官参军，侯官状元翁正春婿。正春无子，以犹子登彦为子，登彦万历二十八年(1600)举人，官至四川布政使右参政。天启六年(1626)，正春卒，道协所分家产较少，颇有怨言，“遂形之章奏，欲甘心少参，大类病狂丧心之语”。徐燏与邓氏为世交，故致书庆棠，先以理劝谕之，以为“嗣子与爱婿虽一体，而关系重轻，颇有差等”，嗣子就是子，女婿毕竟还是女婿，以伦理纲常视之，女婿和嗣子轻重还是有差的，所以登彦分得多，也是理所当然，不可争；夸大其辞，甚至造谣中伤，恶语相加，形之疏草，更不可取。如果出于亲情，请人从中斡旋，请彦登多分点给其妹，既符合于理，又合人情。“不佞托在令先公异姓兄弟，敢抒胸臆，为解此纷，令速毁疏草之板，言归于好。不佞之愿也。不佞与少参交不密焉，敢左右其袒？特据理而论之耳。唯足下更虑焉。”<sup>②</sup>徐燏说，如果就亲疏而言，我和你父亲是异姓兄弟，而彦登则很少交往，怎么可能有所偏袒，直抒胸臆，据理而论，请你考虑。这篇尺牍的措词，显然比致周之夔那篇来得严厉。

同郡吴汝鸣之父卒，汝鸣以督粮之役未急急奔丧，亦未能辞官守制，“城中喧传以为笑柄”，致有“夺情做官”之议。徐燏认为，郡幕，不过是一个散职，三年守制之后，还可以补官，况且还有陈一元、曹学佺这些有名望的乡贤可以帮忙推荐，即便仕宦有成，“因而置田造宅，更何面目复见江东父老乎”？“恐尊公在天之灵，亦抱愤惋不平耳”。因此，奉劝汝鸣“光阴迅速，转盼则小祥，又转盼则大祥矣。愿足下更虑焉。夫然后足下既不失为孝子，而不佞亦不失为诤友”<sup>③</sup>。亡羊补牢，回头是岸，尚有补救机会。忠言逆耳，狂悖之处，幸以宽恕。故陈寿祺评此数书曰：“留示桑梓，不足砭薄俗而垂炯鉴耶”<sup>④</sup>！

作者简介：陈庆元，男，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教授、台湾金门大学讲座教授、福建师范大学教授。研究方向：明清闽海文献与文学。

①《与周章甫》，《文集》册七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4册，第108-111页。

②《答邓道协参军》，《文集》册七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4册，第148-149页。

③《答吴汝鸣》，《文集》册七，《上图稿本》第44册，第43-44页。

④《红雨楼文稿跋》，《左海文集》卷七。